

时评 | 5

□媒体聚焦

解决停车难等社会治理问题,除了政府努力外,让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解决“停车难”需要社会各方献点子

□吴胜武

“早上急着去上班，出门却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给堵了；晚上回来，发现自己的停车位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出门在外，为了一个停车位，玩起碰碰车，甚至动手互殴”媒体调查发现，近些年停车难已经成为很多城市治理的新顽疾。而许多地方在管理上的束手无策，一定程度上又让这种现象有加剧的趋势。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群众在更加理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从目前来

□不得不说

“挖掘机之问”的流行抓住了“草根”心理需求

□王钟

这几天，一个初看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段子走红网络。在很多网络文章的结尾，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于是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有心者不难找到这句话的出处，那是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的广告词。

段子流行到现在，不难识别出它的走红，是蓝翔技校一场成功的营销。这所堪称全国最知名的技校，其品牌营销表现历来可圈可点。除了挖掘机之问被誉为“最接地气”的营销，它曾经还登上过《纽约时报》——因所谓“军方背景”被推测为“黑客摇篮”，蓝翔技校以其神秘的想象空间为公众熟知。

不过，当营销成为一种“现象”，并且受到追捧时，就不仅仅是营销了。大量网友自觉转发段子，为蓝翔造势，除了“搞笑”的因素之外，也表现出社会心态上的认同。

“挖掘机之问”的流行，在于其抓住了“草根”的心理需求。他们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底层、弱势群体，曾经被称为“沉没的声音”，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声音也可以崛起，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表达出来。如果粗略地做一番观察，会发现，蓝翔受众的基本面大概是成长在城市底层或者城乡结合部、农村的青年。他们脱离了农业社会的各种束缚，成为新一批城市人，可他们又在城市文明中找不到固定位置，成为发展浪潮中的浮萍。他们通常没有受过精英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是他们未来发展的较好通道。他们希望通过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希望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可有时也不得不以叛逆不羁的形象示人，在亚文化与主流文化间徘徊着。

即使在蓝翔所“挑战”的青年精英群体中，也不乏对“挖掘机之问”的推崇者。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却因房价、户籍等客观原因，很难在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安全感。他们中不少人转而产生了“屌丝心态”，这不光是出于对边缘“草根”的同情，也是对自身命运的不满之感。

（据《中国青年报》）

微言大义

◎评论员王攀：沈阳规定衣冠不整乘坐地铁，网友质疑歧视弱势群体。本身也算不上歧视。衣冠不整和是不是底层没有必然关系。穿得不好和满身污渍俩概念。一些工种，企业或个人应注意工作服和其他服装的区别。不过，沈阳地铁的回应很糟糕，一方面说主要针对乞丐讨人员上地铁，又一方面说乞丐人员以乘车名义上车也没办法，实在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作家陈岚：哈尔滨一对父母将早产女婴弃垃圾桶，警方发现后责其接回，后婴儿未获妥善医护终离世。遇到弃婴，请不要认真去找家人，除非你们已准备（遭弃罪或故意杀人罪）刑事处理。否则，硬将弃婴塞回，结果很可能是父母会换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处理”，找不到、按法律流程交福利院，国家有“明天计划”，母婴每月拨款1000元，更有无数中国家庭在福利院外求领养。

（据《新京报》）

看，政府管理和服务方面还有一些不足。这在城市日常管理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除了媒体报道的停车难问题，还有绿化保洁、物业管理、出租房管理等问题，也都有类似的境况。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做好加法文章，就是要一如既往地加大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尽可能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比如多修建停车场。另一方面是做好减法文章，就是要转变思路，摒弃细碎都要管、大包大揽搞服务的理念，努力朝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创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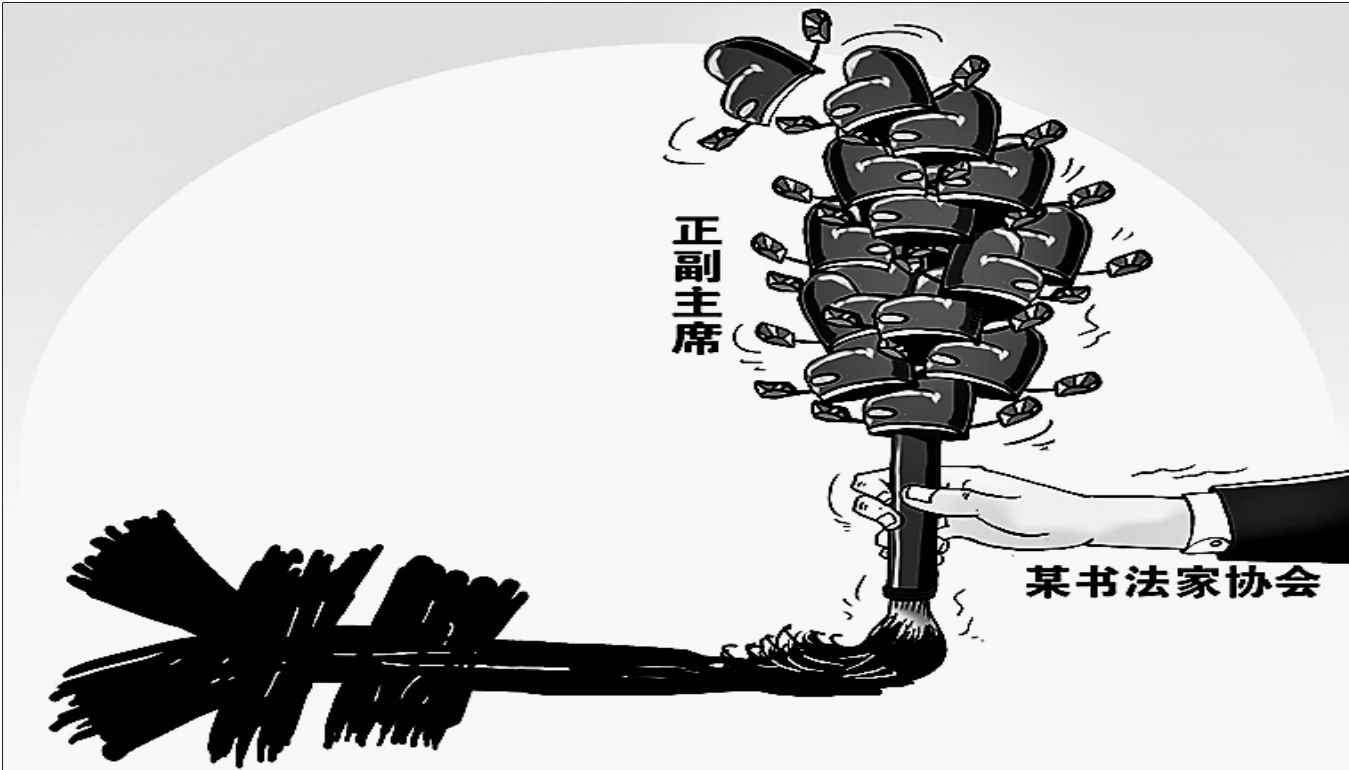
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方向前进，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倍增。

社会治理除了政府之外，其实需要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这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因为在社会治理中，不再单纯地是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这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双向关系，也不再是政府管控一切，其他主体被动接受这种运行模式，而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让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这样一来，好处也显而易见，最直接的就是效率的提高，政府不必大包大揽，专业的事可以让专业的机构去做，管理服务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味表停车位管理这个例子来说，如果将这项工作通过竞标形式外包给专业公司，可能管理的效率会提高，效果会更好。效率的提高带来的还有成本的下降，政府可以把省下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必须做好的地方，也可以进行自身的瘦身改革，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而提高社会整体运行效益，政府累死不好讨、群众怨死不受益的局面也会得到根本改观。

必须明确的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责无旁贷。在此基础上，各地政府要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还需要明确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给予其他社会主体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間，同时调动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认识并做到这些，政府就可以实现社会治理上的收放自如，停车难也就不再是城市顽疾，公众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一些现实难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据《光明日报》）



变味

从研究会、促进会到学会、协会，原本是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如今却是干部“扎堆”，“官味”十足，有的甚至沦为不当利益的“输送带”和四风蔓延的“灰色圈”。湖南清理在社会组织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4332人，新疆排查出983人，山西清理兼职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544人……继中央巡视组前不久专门指出“干部兼职过多”问题，少数省份相继晒出“两栖干部”清理“成绩单”。尽管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的问题屡被诟病，但这样的数字依然令人瞠目，社团组织在官员腐败中扮演的角色也引起社会关注。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公民直言

中华医学会一年收取药企赞助费8.2亿元，却从未对外公开过收支账目

8.2亿元赞助费不该成为难解之谜

作为公益性行业组织,应该具有公开信息规避猜忌与杜绝腐败的自觉意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相关监管部门更应注重对行业组织信息公开的制度约束,切实承担监管职责

□舒圣祥

一年内召开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审计署6月公布的对中华医学会的审计报告，曾引起社会关注。3个多月过去，却一直没有中华医学会的任何整改消息，留下一连串疑问待解：巨额赞助费到底去哪儿了？中华医学会3个月说不清8.2亿元赞助费去向，可以想象公众的感受和反应。诚然，企业参与赞助医学会议是国际惯例，公开标注不同等级赞助商资格也不足为奇。在国内医学

圈子里，中华医学会汇聚着全国最好医院的最好医生，药企蜂拥而至，其赞助费收入动辄上亿元，实属正常。

关键问题不是一年收取8.2亿元赞助费，而是这些钱有没有从中饱私囊的可能。作为一家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的行业组织，中华医学会这么多年一直在收赞助费，却从未对外公开过收支账目。在很多人心 中，中华医学会大概是另一个中华牙防组——这样的武断评价，固然不尽公允，但中华医学会3个多月说不清赞助费去向，实属不该。

何止中华医学会3个月没有整改信息值得质疑，所有那些“已经整改”、“正在整改”的冤统信息，都值得推敲——那些“年年审年年犯”的“保留节目”，皆是此类整改的“成果”。所以，中华医学会3个多月没有整改信息，不是个别现象。

审计部门将中华医学会接受企业赞助的数据公之于众之外，更该告诉公众赞助费是否合理运用到公益事业之中。除了审计部门有义务“帮助”中华医学会说清赞助费的去向之外，中华医学会的相关主管单位和管理部门，同样有这样的

责任和义务。

所谓自行整改，本就公信力不足。比起中华医学会的自行整改和主动公开，公众更希望看到监管部门的及时介入和公开信息。中华医学会的赞助费被舆论称为“灰色生意经”，这个“灰色”地带本不该存在。一方面，作为公益性行业组织，应该具有公开信息规避猜忌与杜绝腐败的自觉意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更应注重对行业组织信息公开的制度约束，切实承担监管职责。

（据《中国青年报》）

□看到就说

这些年,从变形金刚到蜘蛛侠,从麻匪到喜羊羊,从西游师徒到国宝熊猫,巨奖得主始终在童话世界“犹抱琵琶半遮面”。获奖者个人信息应否公开?

让5.25亿巨奖得主卸下乔装

□邓海建

10月13日上午，在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中国彩票史上第三大奖得主身着卡通服装神秘现身兑奖。当日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吸引了众多媒体前去采访。为保护个人隐私，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工作人员还特意要求在兑奖前新闻发布会现场所有人员都签订了保密协议。

这些年，从变形金刚到蜘蛛侠,从麻匪到喜羊羊,从西游师徒到国宝熊猫，巨奖得主始终在童话世界“犹抱琵琶半遮面”。获奖者个人信息应否公开？这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2009年7月1日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发行机构、销售机构等因职务业务便利知道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应当对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再说,公开的后果也未必幸福。数年前,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一大二学生中得双色球500万元,消息已经很快传遍全校，不堪其扰的得主最终只好退学。

福彩中心针对这一轮的质疑，回应称目前还没遇到主动要求公开个人信息的大奖得主，因为怕大奖给生活带来麻烦和骚扰。而在5.2亿巨奖爆出后，中彩网也针对大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5千多网友参与答卷,结果,“近7成网友不愿公开

（据《光明日报》）

□一家之言

一父亲为给女儿筹集医药费摆摊卖卫生巾,获41万元善款却突然逃逸

个人募捐如何善始善终

□堂吉伟德

日前，王海林男扮女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女儿筹集医药费。短短一天，获得41万元善款。然而，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善款去了济南。他和他的家人,出于某种顾虑和安全考虑，也不愿向媒体和好心人透露后续收到的捐款数额。

一夜离开成都去济南的“陡生变故”，让民间慈善的安全性这一现实问题，再度被摆上桌面。虽然事实如何尚不明晰，但假若善款没有被合理使用，靠什么来进行弥补和纠错？按照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只有基金会、民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可以组织公益募捐、接受捐赠。社会自发捐赠，不受《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约束。捐给个人的善款，只能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来确保安全，安全性自然极为脆弱。

其实，面对民间的自发捐赠，必要的时候也需要相关机构的介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捐助对象均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政府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关注其生存状况，并提供相应的制度救济。公权力机构出于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法定责任，也当然应该监督善款被用于被捐助对象，防止各种侵犯被捐助对象权益的事情发生。如果,有的家长获得了善款，却放弃对患儿的治疗，有关部门就当出面解决此事。



验孕约战

近日,西医是赏10万元挑战中医能否诊断验孕的消息引发关注.发起者“烧伤超人阿宝”通过微博称,目前挑战赛正在筹备,除此前迎战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杨枫医师外,成都老中医吕即来也报名参赛,并自愿出20万作为奖金。

长期以来,中医因为历史以来的条件所限,其“黑匣”理论一直备受诟病。如果能通过这次“验孕约战”,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进程,那更善莫大焉。

（据《华西都市报》）